

中国 文化史略



吴存浩 于云瀚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0112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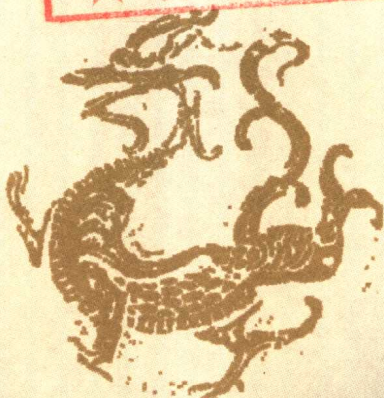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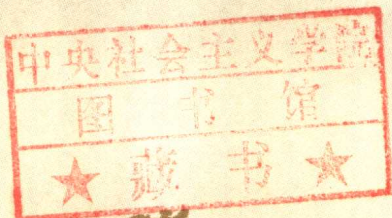
K203
169

中国 文化史略

吴存浩 于云瀚 著



201123131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史略/吴存浩,于云瀚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1

ISBN 7-80623-452-7

I. 中… II. ①吴…②于… III. 文化史 - 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93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15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371000
承印单位 安阳市印刷厂	印数 1—4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452-7/I·340	定价 2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第一章 概论	(1)
第一节 文化与中国文化史释义	(1)
一、文化内涵与外延	(2)
二、中国文化史含义	(7)
第二节 中国文化史特征	(11)
一、多元性与独立性	(12)
二、内化性与连续性	(17)
三、稳定性与民族性	(22)
第三节 中国文化史研究现状、任务与意义	(27)
一、中国文化史研究现状	(27)
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任务与意义	(31)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孕育	(38)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滋生	(38)
一、中国人的起源	(38)
二、采集渔猎文化的魅力	(44)
第二节 中国文化体系的孕育	(50)
一、农耕文化的阳光	(50)
二、血缘文化的裂变	(61)

三、彩陶、黑陶文化风貌	(69)
四、居住文化的形成	(72)
五、宗教文化的产生	(76)
六、华夏文明曙光	(83)
第三章 中国文化的雏形	(91)
第一节 神本文化向民本文化的嬗变	(91)
一、殿堂威严与青铜神韵	(92)
二、巫史文化的盛衰	(97)
三、甲骨文与金文气韵	(107)
四、宗法文化的盛行	(111)
第二节 天人文化的探索	(118)
一、铁血时代的开启	(118)
二、诸子百家文化韵味	(128)
三、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元典整理	(143)
四、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	(149)
五、“天人”文史艺术观的乐章	(155)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定型	(161)
第一节 文化“一天下”	(161)
一、制度与思想文化的“一天下”	(162)
二、儒学经学化与经学谶纬化	(171)
三、道教产生与佛教东来	(181)
第二节 宏阔的意识内涵	(187)
一、“秦砖汉瓦”内涵	(188)
二、秀丽的乐府与堆砌的汉赋	(193)
三、“史家之绝唱”与艺术“情理”之美	(196)
第五章 中国文化的融会与自觉	(203)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融会	(203)
一、世族文化的崛起	(204)

	二、经学中衰与玄学盛行	(211)
	三、道教成熟与佛光普照	(225)
	四、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会	(235)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自觉	(238)
	一、乱世中的文化建设	(239)
	二、兴旺的史学与文学的自觉	(246)
	三、石窟:艺术的“形神”之美	(253)
	四、炼丹术:古代科技之光	(260)
第六章	中国文化的整合	(266)
第一节	文化隆盛时代的风韵	(266)
	一、“有容乃大”的文化气度	(267)
	二、文化建设与科举取士	(273)
	三、儒学振兴与经世精髓回归	(278)
	四、多种宗教流行与道教、佛教兴旺	(284)
	五、博雅风韵的生活文化	(292)
第二节	流光溢彩的精神文化	(301)
	一、灿烂的科学技术文化	(302)
	二、唐诗·诗唐·诗魂	(309)
	三、古文运动与史学繁荣	(318)
	四、飞天:艺术的“意境”之美	(326)
	五、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337)
第七章	中国文化的再造	(344)
第一节	理学构建与文化融合	(344)
	一、两宋理学构建及影响	(345)
	二、官学、书院、义学与科举制度	(353)
	三、文化中心南移与融合	(356)
第二节	雅文化的内秀与俗文化的浓烈	(362)
	一、古代科技的巅峰	(363)

	二、实证史学的兴起与古文运动的澎湃 …	(367)
	三、“以文为诗”及词、画的“高雅” ……	(369)
	四、平民文化的勃兴:说话与戏曲 ……	(373)
第八章	中国文化的反思 ……	(379)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高度成熟与沉暮 ……	(379)
	一、专制文网与传统文化一统 ……	(380)
	二、史学的繁荣与目录学、金石学的辉煌 ……………	(387)
	三、叛逆精神与传奇、小说的绚丽 ……	(390)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新生 ……	(395)
	一、“心学”:主体意识的觉醒 ……	(395)
	二、“西学”东渐与中西文化冲突 ……	(402)
	三、启蒙初潮的激荡 ……	(410)
	四、科技文化的新探索 ……	(416)
第九章	近代文化的流变与整合 ……	(421)
第一节	西学冲击下的文化论争 ……	(421)
	一、“夷夏大防”与“师夷长技” ……	(422)
	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426)
	三、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 ……	(430)
	四、革命与改良 ……	(436)
	五、“欧化”与“国粹” ……	(438)
第二节	近代教育与文化传播 ……	(442)
	一、书院改制与近代新学制的确立 ……	(442)
	二、报刊发行与出版机构的建立 ……	(446)
	三、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出现 ……	(448)
	四、文化产业运作与社会进步 ……	(450)
第三节	伦理变迁与移风易俗 ……	(452)
	一、近代新道德观的提倡 ……	(452)

二、生活习俗的变迁	(459)	目 录
三、白话文的提倡	(463)	
四、新文化运动与道德重建	(465)	
后记	(472)	

第一章 概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跌宕起伏,绚丽多姿,历久而弥新,不仅是世界上曾经一度走在前列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自己历史的文明古国。但由于众多文化概念和理论难以达成共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本深刻揭示中国文化史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的史学著作问世。这种状况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一直没有中断自己的文化史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缺憾。为准确把握中国文化史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机制,必须对中国文化史的有关概念和特征予以界定,以便为中国文化史的论述提供较为坚实的立论基础。

第一节 文化与中国文化史释义

“文化”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最基本概念,“中国文化史”则是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特殊范畴。因此,有关“文化”与“中国文化史”的内涵与外延的确定,不仅关系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而且决定着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有关理论,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一番理论探讨。

一、文化内涵与外延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经历了由“文”与“化”各自为词到组成“文化”一词的过程,其含义由精神现象扩展到人类创造行为与成果,体现了内涵和外延不断被拓展的特点。

“文”的本意,指的是色彩交错的纹理。《周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由此,“文”被引申为装饰、修整和人为加工与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性符号,再被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言辞文章和德行道义、美善文德等。

“化”的本义为生成、造化、变易等,指的是两种事物一方或双方的形态与性质发生变化。由此而被引申为教行、迁善和“化而成之”等。

“文”与“化”连在一起使用,大概始自战国。《易·贲卦》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此,天文与人文相对应,“文”与“化”连用,已带有“以文教化”的意义。

西汉后,“文化”才作为固定词出现,含义大都是以文教化,即以封建伦理道德来教化世人,并与武力征服相对应。刘向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①自此以后,在古汉语中,“文化”的含义基本没有多大扩展。

在西方,“文化”一词也带有“以文教化”的含义。英文“culture”源于拉丁文“cultura”,本义为耕作、居住、练习、留心、注意、敬神等,在英文中则引申为对树木和禾苗的栽培,并进而扩展为对心灵、知识、情操和风尚的塑造与培养等,表明“culture”一词的含义

^① 《说苑·指武》。

是由人类物质生产活动逐渐向精神创造活动延伸的,与古汉语“文化”所带有的“以文教化”含义大体一致。

“文化”作为内涵异常丰富概念的阐发和研究,始自欧洲。伴随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学者发现,不同地域的文化,内容及性质大相径庭;即使同一地区的文化,也并不是一成不变,而呈现为一种动态性变异特征。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地域和时间上的差异性,诱发了对文化内涵与外延的探讨与研究,不仅促使人类文化学、民族文化学、社会文化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产生,而且也导致了文化含义具有多样性。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关于“文化”的定义有200多个。如此众多的“文化”定义,使初涉文化学的人无所适从,甚至连文化学界的精英也感慨万千:“关于文化的争论,变化多端,而且愈来愈激烈。”^①

关于文化定义,在国外,主要有人类学派文化定义、传播学派文化定义、历史地理学派文化定义、功能学派文化定义、结构学派文化定义、文化形态史观学派文化定义、新进化论学派文化定义、符号文化学派文化定义等。

在国内,近代学者在深厚国学基础上汲取融会外来文化观,提出了一些较为独到的见解。梁启超是对文化含义探讨较早也较深的一位学者。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各种业果而言。”^②继梁启超之后,学者或多或少涉及到文化概念。蔡元培说:“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③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④，“是生活的样法”。^⑤陈独秀说:“文化是对军事、政治、产业

① 路易·多洛:《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12月7日。

③ 《蔡元培美学文集》,第1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63年。

④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一章,学林出版社,1987年。

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辽宁大学哲学系自编教材。

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种。”^① 冯友兰则认为，文化是一种“总合体”，“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之总合体。”^② 近代文化学专家黄文山指出：“文化的内容，是由人类过去的遗业所构成的。所谓遗业，在性质上是积累的，而积累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现象”；“文化现象以内部状态为最重要，故心理的、统形的方法，值得重视。”^③ 显然，在近代，中国学者的文化观已带有现代文化含义的韵味。

不过，在以往文化含义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要么注意外在文化创造物的发展，忽视了文化创造者的能动作用和人自身的再造过程；要么注意人这个主体对于文化的创造，但忽略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放弃了对物化文化的研究。这两种倾向都能够导致文化研究中内化和外化的脱节、文化主体与客体的割裂，从而使文化的本质与外延难以得到深刻而准确的把握。

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人是主体，客体是自然。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指自然界，而且也包括人类自身的各种自然属性。文化学的出发点，即在于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有了人，就开始有了人类历史，也便有了文化。文化与人类俱来，人类与文化同长。人创造了文化，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身。因此，任何人都只能是以时代的人而存在，是时代文化所塑造的一种结果。任何超时代的人，不仅过去没有，即使将来也不可能存在。人类诞生之初，“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④ “人道”少得可怜，但远古人类终归还是拥有了文化塑造在其内。伴随时代不断发展，在“人道”越来越被人类所拥有的同时，社会也趋向更加文明，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文化也相应地表现为量的逐渐增加和质的不断升华。因

①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②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第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③ 黄文山：《文化学的方法》，《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此,任何人类文化的进步,都无一例外地包括通常所说的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和人类自身各种自然属性的“自然的人化”这两个方面。

因此,我们可以为文化下这样一个本质性的定义:文化即是人类化,既是自然的人化,也是超过人的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

从文化的这个定义出发,文化的外延既包括外在文化产品制造,也包括内在文化塑造。所谓外在文化,指的是人对客观存在物的创造,是人类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改造客观自然,使外在客观获得人类灵气而变成文化产品,即通常所说的自然文化,或文化物化。所谓内在文化,是指文化对人类自身所带有的动物属性的不断克服和文化属性的不断提高。内在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是在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中得以升华的。这样,在文化被创造和人自身被塑造的双重过程中,外在文化与内在文化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统一,也为文化与文化史研究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和基本出发点。

关于文化构成,通常解释是,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①如此界定文化的外延似乎存在较大的缺陷。这是因为,如果仅仅将文化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部分,那么,人类创造文化的行为,即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时的“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将属于何种文化?人类自身自然属性被改造所体现的文化又属于何种文化?

有的学者将文化的外延规定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大类别,技术体系指人类加工自然形成的技术的、器物的、非人格的、客观的东西;价值体系指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两者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

^① 《辞海》,缩印本,第153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文化统一体,组成广义文化的全部内容。这种文化定义不仅同样没有将创造文化主体人的行为也纳入文化范畴之中,而且对于语言和社会结构这两种人类文化现象所给予性质的确定也带有一定偏颇之处。

此外,关于文化构成还有三层构成说,认为文化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体系构成;有四层构成说,认为文化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风俗文化和思想与价值文化四个层面组成;有多层结构说,认为文化由物质文化、社会关系文化、精神文化、艺术文化、语言符号文化、风俗文化等六大体系构成。显然,这些观点也都具有自己的合理性,但也有一定的偏颇之处。

其实,对于文化的外延,前人曾作过极为精彩的论述。龚自珍即说:“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于饮食,中乎制作,终于闻性与天道。”^① 这表明,龚自珍不仅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意识文化三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明确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物质文化(饮食)是人类的基础性文化,意识文化(天道)是较高层次的统帅性文化,而行为文化(制作)则是连接物质文化与意识文化的桥梁。

从文化的广义概念上去探讨人类文化的外延,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文化构成无外乎由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意识文化三部分组成。对此,有的学者已进行了较为恰当的描述:

可以从文化要素的不同上把文化划为三大块,即意识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在意识文化中,意识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物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物质文化产品则恰巧相反,它的功能作用全是物质性的,其意识只表现为该产品是按意识要求制作和运转的,其意识是为它的物质功能服务

^① 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

的……(行为文化)是因为它受意识调节并作为意识的外化而存在……以其浓厚的意识性和坚实的物质性并重的状态而存在。在行为文化的两端是意识文化和物质文化,意识文化通过行为文化向物质文化转变。^①

从此种文化外延出发,人类文化不仅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意识文化三大体系,而且可以看到构成文化的各种文化体系皆具有极其浓厚的综合性特征,即各种文化体系都能够体现出物质的、行为的和意识的文化特色,从而使不同文化外延呈现为相互交叉与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从而为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二、中国文化史含义

对于中国文化史的命名,既有称为“中华文化史”者,也有称为“中国文化史”者,还有称“华夏文化史”者。我们认为,还是称“中国文化史”较为妥当。

在这诸多不同的称谓中,文化的含义已予以界定,因而关于文化史的含义可界定为:文化史是指有关人类文化发生、发展与演变历史规律的一门科学。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弄清楚关于“中国”、“中华”、“华夏”等词含义的不同之处。

在语义上,“中国”、“中华”与“华夏”既有联系又存在本质性差异。从含义上看,在古代,“中华”与“华夏”主要是指中国境内文化先进的民族。“华夏”是汉族先民的古称,指的是居住在以伊洛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炎黄部族及其后裔。到春秋之际,“楚失

^① 韩民青:《文化论》,第102~10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华夏”^①、“裔不谋夏，胡不乱华”^② 等话已成为文人的口头禅，说明此时“华夏”已是中原人的自谓之语。“中华”一词由“中国”与“华夏”二词复合而成，意为居住于天下中心且文化优越的民族。此词约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际。《魏书·礼志》说：“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处中华，德祚微浅。”

与之相比，“中国”一词的含义更为广泛而深刻。“中国”一词在出现之际便带有国家的含义。“中国”作为我们国家的名称，其核心在于一个“中”字，其含义不仅是大一统国家的正统名称，而且还能反映中国人自古以来即存在的“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观念。固然，这些意识带有错误和偏见，但错误和偏见本身即是历史真实的一种体现。

“天下中心”为“中国”一词的本义。自夏代开始，中国人即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中心，周边国家不过为“四夷”而已。因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为中原地区，致使这一地区早在夏代即被视为“四海”、“四夷”和“天下”的中心。《尚书·大禹谟》说：“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在文献中，“中国”一词首见于《尚书·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在实物史料上，迄今所见当为西周初年的《何尊》。其铭文为：“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因此，“中国”一词的本义应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之中”的国家，为四方之中，世界之中。为此，《诗经·大雅·民劳》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中国”所具有的“文化中心”含义，是中国文化史自身发展的一种体现。在历史上，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首先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并长期走在周边地区的前列。崛起于中原地区的

①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② 《左传·定公十年》。

王朝,被称为“中国”,因其文化先进又被称为“华夏”。这里的“夏”为王朝名称,而“华”则带有文化灿烂的意思。因此,中原这片哺育中国文明诞生和繁荣的沃土被视为拥有高度文明的“化内之地”,而把农耕文化发展水平较低和游牧文化分布的周边地区称为“化外之地”,从而产生了“南蛮”、“北狄”、“西戎”和“东夷”等称谓。虽然,此类称谓伴随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了解的逐渐拓展而呈现不断有所改变的趋势,但直至近代,仍将西方人称为“夷”、“夷人”和“夷类”。这说明,在以往中国人心目中,“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曾是左右中国人的行为和意识的一种痼疾。

汉代扬雄即是从“文化中心”和“天下中心”的双重含义上来解释“中国”一词的:“孰为中国?曰:王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①正因为将中国视为文明的渊藪,世界的中心,从而才将中国称为“中华”。对此,《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中国”作为东亚大陆上建立起来的统一、合法、正统国家的惯用称谓,则是由“文化中心”所引申出来的第三种含义。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一王朝的称谓固然不同,但无不以“中国”相称,无论是汉唐,还是宋元,或是明清。历代统一王朝之所以被统称为中国,所表明绝不仅仅在于这个国家为“天下之中”,而且还带有该王朝是合法的、正统国家的含义。“合法”与“正统”的根基即在于文化传统。

固然,将“中国”作为“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带有极大的偏见,是一种夜郎自大的表现,但这种意识也曾对中国人所拥有的特别“天下文化观”的树立和中国文化所具有的醇厚、平和色彩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难见“世界”一词而多见

^① 扬雄:《法言》卷四,《问道》。